

〔日〕清水凯夫著

六朝文学论文集

韩基国译



重庆出版社

日本学者清水凯夫著

六朝文学论文集

韩基国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日)清水凯夫著 韩基国译
六朝文学论文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5 插页7 字数326千
1989年5月第一版 1989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66-0812-8/I·160

定价：4.20元

前 言

——日本研究中国六朝文学的概况

总的来说，我国战前对中国六朝文学的研究是不活跃的，在长达六十余年间仅有论著八十余篇。但是，战后四十年的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也有了质的飞跃，到目前为止出现论著1300多篇，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即1945年至1977年三十二年的研究成果汇集收录在《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战后编）》（日外文化协会，1979年出版）中，从中不难看出这几十年的研究全貌，这部要览甚为方便。后八年的成果逐年均有报告，从《日本中国学会报》的学会展望栏及《东洋文献类目》的文学栏亦可了解其概观。

从这些文献资料的索引可以看出，在三国六朝文学方面，从对个别作家的研究到对文学批评（《文心雕龙》、《诗品》）、总集（《文选》、《玉台新咏》）、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乐府、民歌、文体、诗体论、语言、语法等的研究，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领域，即便说有些过于细致也不言过其实^①。

对于个别作家研究较多的是曹植、阮籍、嵇康、潘岳，陆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沈约，庾信，颜之推，其中对陶渊明的研究最突出、已发表的论著在一百篇以上^②。

铃木虎雄《陶渊明诗解》（弘文堂，1948年）、斯波六郎《陶渊明译注》（东门书房，1951年）、吉川幸次郎《陶渊明传》（新潮社，1956年）等三部著作是早期的研究成果，都趣味

深长地描绘了陶渊明的形象。一海知义继承这些研究成果，撰著《陶渊明》（岩波书店，1958年），对渊明形象作了更加精密细致的分析，大矢根文次郎著《陶渊明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67年），综合了对陶渊明的研究成果。后来，冈村繁在《陶渊明——世俗与超俗》（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74年）一书中大胆地描绘出世俗性的陶渊明形象，引起了极大关注。是世俗性的人物，还是超俗性的人物，这个问题也与中国说的“人民性”，“艺术性”相关，对陶渊明的研究一直是一个不断论争的重要问题。近年出版的南史一的《诗传陶渊明》（创元社，1984年）也是论述这个问题，从陶渊明的诗作中抽象出具有特色的渊明形象，播下了这一话题的种子。可以期望今后将会通过这种论争对真正的渊明形象继续探索下去。

在总集方面，对《文选》的研究很活跃，有七十余篇论著，取得了值得瞩目的成果^③。

特别是斯波六郎完成的《文选索引》（广岛大学中文研究丛刊，1954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9年再刊），是一部《文选》收录的全部作品的便览索引，不仅对《文选》的研究者，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广大研究者都提供了极大方便。他在《文选》版本的研究方面也留下了卓越的著作。其中《文选诸本的研究》（斯波博士退休纪念事业会，1957年）尤其著名，成了《文选》研究者的必读书。

《文选》译注有小尾郊一和花房英树合著的《文选》（集英社·全释汉文大系，1974—1976年，六册）的全译，内田泉之助和网拓次合著的《文选（诗篇）》（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1963—1964年），中岛千秋《文选（赋篇）》（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1976年），中岛千秋《文选（文章篇）》（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1977年），网拓次《文选》（明德出版社，中国古典新书，1969年）以及高桥忠彦《文选》（学习研究社，

1985年)等,这些抄译著作对于解读《文选》的作品提供了方便,为《文选》的基础研究作出了贡献。

如上所述,虽然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文选》的论著,也取得了成果,但这些著作尚停留在版本的研究,译注,编制索引等基础研究上,对于探索《文选》本质的研究,可以说基本上还未进行。因此,神田喜一郎博士曾经提倡“新文选学”的必要性。我与博士的这一倡导相呼应,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文选》的论文,对探索《文选》的本质作了尝试。本《论文集》收入的八篇论文便是这一尝试。这些论文至少从历来的基础研究领域中迈出了一步,试探《文选》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诗文集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为这些论文是“新文选学”的第一步而感到自负。当然,这些撰著尚有不少不足之处,也可能存在着试行性的错误,但是,若能以此为基础展开论争,并通过论争真正探明《文选》的本质,我将喜出望外。

在文学批评方面,以研究《文心雕龙》和《诗品》为盛行,但前者占压倒多数④。

兴膳宏的《文心雕龙》(筑摩书房,世界古典文学全集25,1968年)被誉为是最早完成这部难解的文学理论书的译著,而且他撰写的《〈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应》(吉川幸次郎博士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论集)、《〈文心雕龙〉的自然观照——求其源流》(白川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史论丛,1981年)、《〈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论集〉——论二者的内在联系》(中国中世纪的宗教与文化,1982年)等三篇文章是接近《文心雕龙》本质的佳论,受到高度评价。

此外,《文心雕龙》的译注有户田浩晓的《文心雕龙》(明治书院,1977年)和目加田诚的《文心雕龙》(文学研究《九州大学》连载);索引有冈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广岛理科大学汉文学丛书,1950年),这几部著作对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方便。

日中两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都很活跃，近年来甚至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学会，从综合研究到各篇章的具体分析，几乎从所有的角度进行探索，可以说对这部文学理论的研究是很充实的。不过，在关于后世的影响问题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大多数《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几乎不加具体分析就以类推的方法论述《文选》是以《文心雕龙》的理论为标准选录的，等等，我对这一点抱有疑问并较认真地分析研究了《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关系，这就是本《论文集》收录的三篇论文即《〈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关于散文的研讨》、《〈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关于韵文的研讨》”。现在已经明确，《文选》与《文心雕龙》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影响关系。

期待今后不仅研究与《文选》的关系，而且研究与初唐的文学理论以及盛唐的近体诗的关系，对许多影响关系继续详细地分析研究下去。

作为代表研究中国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全部成果的是林田慎之助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创文社、1979年）。此书详细分析了自汉魏至隋唐的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该书也有不少疑问点，并非都得到大家的赞同。尤其是第四、五章的“齐梁时代的文学理论”（上）（下）等有很多问题，其中二、三节的“南朝文学放荡论的美学意识”和“论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批判森野氏论文《简文帝的文章观》”，甚至与森野繁夫发生了论争。由于《与湘东王书》，是探讨六朝末期文学理论必定要提到的重要文献，所以应该首先明确其真意，但是，两氏均过于在书简字句的解释上煞费苦心，而忽视了对重要历史背景的追求，结果是一番激烈的论战并未达到一致的认识，便中途罢笔了。我认为应该在充分联系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探索此“书”的真意，并作了这方面的实际调查研究。

这就是本《论文集》收录的《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考》。此文大概消除了林田森野两氏的争论点，是近乎《与湘东王书》的真意的。

关于“永明体”或“宫体”的诗体的研究，是与文学批评有联系的，但在这一方面不如其他领域的研究活跃，战后也未见有多大进展^⑤。然而，这与近体诗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上说，研究“永明体”或“宫体”的诗体是中国诗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必须推进这项研究。特别是现存的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而宝贵的文献，日本学者有责任推进这项研究工作，这样说并不过分吧！我以这种观点撰写了三篇论文，即《沈约声律论考》、《沈约八病真伪考》和《沈约韵纽四病考》。这三篇文章是采用新的方法论，即采用分析现存的沈约诗的音韵配置情况，从中归纳出其声律论的方法对探明“永明体”的具体内容所作的尝试。虽然结论或许有不妥之处，但无论如何确实可以说是别开了生面。若以此为契机，诗体的研究活跃起来，我将感到荣幸。我个人将继续用这种“方法”逐步探求“宫体”、“沈宋体”等诗体的具体内容，以期最终探明近体诗是经过怎样的过程形成起来的，因此望同人学者赐教。

此外，战后在六朝文学的研究方面对小说的研究也颇盛行，《人物志》、《列仙传》、《搜神记》、《抱朴子》、《神仙传》，《世说新语》等作品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其中以《世说新语》的研究最为活跃^⑥，仅译注就有目加田诚的《世说新语（上）（中）（下）》（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1977年），此外还有大村梅雄，川胜义雄，森三树三郎等人著述的译注共六种。至于论文已发表五十多篇，可以看出这项研究的充实情况。

以上所述即我国战后四十年间研究六朝文学的概况。总的来说研究的内容有些过于细密，但却是非常充实的。不过具体看

来，在各个领域中有定论的研究却出乎意外的少。这可能是因为想不到各个研究者对他人的研究抱着不干涉的态度，很少开展直言不讳的批评的缘故。因此，期待今后不断明确研究的分歧点，展开争论，为通过争论得出定论而努力。若能以本《六朝文学论文集》为契机，广泛开展论争，发展六朝文学的研究，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最后对翻译本《论文集》的重庆师范学院韩基国副教授及对本书的出版给了大力关怀和支持的重庆出版社责任编辑赖云琪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水凯夫

1987年11月1日

（文中注附后）

0283/14

目 次

前 言

——日本研究中国六朝文学的概况·····	(1)
《文选》撰(选)者考	
——昭明太子和刘孝绰·····	(1)
《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选)录问题·····	(19)
《文选》编辑的周围·····	(31)
昭明太子《文选序》考·····	(47)
《文选》编辑的目的和撰(选)录标准·····	(67)
《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	(94)
《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	
——关于散文的研讨·····	(106)
《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	
——关于韵文的研讨·····	(124)
梁代中期文坛考·····	(143)
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考·····	(176)
沈约“八病”真伪考·····	(194)
沈约声律论考	
——探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	(212)
沈约韵组四病考	
——考察大韵、小韵、傍纽、正纽·····	(239)

庾信文学.....	(271)
庾信小传.....	(300)
王褒传记与文学.....	(323)
附表.....	()

附记

日本战前战后八十年间研究

中国六朝文学著述篇目索引.....	(372)
-------------------	---------

编后记.....	(393)
----------	---------

《文选》撰（选）者考

——昭明太子和刘孝绰

—

所谓批评，是一种自我表现。可以说，建立在这种批评上的图书编辑仍然是一种自我表现行为。不言而喻，如《全唐诗》、《全唐文》等，其目的是收集全部作品，需要区别作品的不同性质。但是，如《文选》、《玉台新咏》等，是选集，必须选择作品，对作品的批评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是反映编者的思想、信念、爱憎、资质等等。

选择作品时，未必能说是编者先确立理论再按照理论作批判的选择。实际上多数情况与此相反，最先以编者的思想、信念、爱憎、资质等极其主观的鉴赏和实感进行批判的选择，然后确立其理论根据。即使事先确立有理论，但由于文学作品本身一般是依存于主观的作用，所以批评每一具体作品时，一律对照事先确立的理论作基于理论标准的批判选择几乎是困难的。至于具体的批判选择，编者本人的思想、信念、爱憎、资质等是有重要影响

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夏目漱石认为“文学评论”可分为三种批评态度，即“专以个人好尚的‘鉴赏性的’态度”和“不以个人的好尚，冷静而科学地分析作品的构造、组织、形体的‘非鉴赏性的或批判性的’态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二者兼有的批判性鉴赏’的态度”，总之，以‘批判性鉴赏’为是。我认为实际批评时这一批评态度是恰当的。至于六朝末期编辑的《文选》，其编者对作品的批判选择情形，大体上也是同样的。

如拙文《关于〈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录问题》所详论：‘刘先生夫人墓志’，是刘孝绰为恢复所敬爱的刘焯及其夫人的名誉而收录的，《头陀寺碑文》也同样是刘孝绰为慰藉在恶评中遭杀害的刘焯的灵魂而收录的。可以说这都是以编者的好尚的“鉴赏性”态度收录的作品。在《文选》中这样选择的齐梁时代作品是相当多的^①。这恰好是确定编者的材料。

《汉武帝诏》、《贤良诏》、《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天监三年策秀才文》等，可看作在文体上有代表性的例子，大概是以冷静地分析作品的构造、组织、形体的“非鉴赏性的或批判性”的态度选择的。其余的多数作品，好像是以“批判性鉴赏”的态度选择的。

无论是哪一种态度的选择，《文选》的编辑毕竟是一种自我表现的作为，是把自己描写的“文”的形象表现为选集的作为，理所当然地要反映编者的思想、信念、爱憎、资质等。因此，要探明《文选》的实际情况，确定编者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然而，历来的评论家，往往是一边评论《文选》、一边又意外地任凭《文选》的编者暧昧不明。例如大多数评论家虽然承认“《文选》的编者虽然是昭明太子，但其文学集团的领袖人物刘孝绰被看作是实际上起编纂领导作用的人”（林田慎之助著《中国中世纪文学评论史》第四节编辑《〈文选〉与〈玉台新咏〉的

文学思想》，四一八页）。铃木虎雄博士根据《梁书·昭明太子传》及《隋书·经籍志》“昭明太子撰”的记述说：“其文取之标准，在于‘兼文质而无伤风教’。是，不仅可视之为其（指昭明太子——笔者）持论，而且取《文选》读之时，足知用意在此”（《支那诗论史》第四章“取舍齐梁时代（二）文学标准说”七九页）。小尾郊一博士说：“《文选》采用的作品并非都是独创性的和经过修饰的作品。昭明太子虽然明确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的标准，但在实际选择文章时另有自己的尺度。他认为内容与形式的谐和统一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即所谓‘文质彬彬’的文章。”大家知道，“文质彬彬”是《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的用语。小尾博士引完该《书》后，继续说：“由此可见，他厌恶煞费苦心在技巧上过分下功夫的美文，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欣赏有道德内容的文章。他在编辑《文选》时又多半是用这个尺度衡量的，只要看一看《文选》的作品，就会完全理解”（《昭明太子文学观——以〈文选序〉为中心》，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27）。

上述两种评论都是卓越的见解，不过，遗憾的是并非探明编辑《文选》的中心人物，而是援引不见于《文选序》的昭明太子文学观（“他的持论”）论述《文选》的编辑方针（“撰录标准”）。如若《文选》是以昭明太子为中心编辑的，当然“他的持论”不但要反映在对作品的选择上，而且应在《文选序》中表明是撰录的标准，尽管已书于一书简（《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也是不该省略的。因此，在《文选序》以外的著述中寻求撰录标准不是矛盾的么？

另外，在作品的选择问题上也有互相矛盾的说法，例如，说《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一方面明显地是“‘文质彬彬’的文章”，一方面又和“他的持论”不相一致，这类作品采录得相当多。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大概

在于照字面解释史书中关于“昭明太子撰”的记述，把太子看作是编者的中心，没有慎重地确定《文选》的编者。除上述两种论述以外，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著述也有不周到的地方^②。这在探明《文选》上是很不理想的。

因此，本文拟以上述问题为重点，通过以前述“鉴赏性的”态度研讨所收录的作品，探求编辑的中心人物和察明编辑《文选》的实际情况。

二

如上述，在探明《文选》的编辑方针和撰录标准时，由于只依靠序文难以具体把握，所以大多寻求引用昭明太子《文选序》以外的著述。但是，这种方法只有《文选》的编者中心是昭明太子才能成立，否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所谓这位昭明太子是编者的中心的根据，实际上不过是非常脆弱的。《梁书·昭明太子传》（卷八）：

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经典诂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又《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

文选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

由于上述记载很明确，所以乍一看好象是存在着可靠的根据。但是，一般在史书中，即使有所谓帝、太子、王撰的记载，实际上也是帝、太子、王只下达编辑的命令，而把编辑委任给臣下，完成后或只冠以代表者之名，或只书以序文，这种情况居多，所以不足为可靠的根据。就当时史官的心理来说，由于是命令他们担任编辑工作的主持者，所以无论是谁实际“撰”的，史书记载帝、太子、王是“撰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这种记载大多不意味是实际的编辑中心人物，不意味是按照自己的心像

完成选集的编者。现在，看一下《梁书》、《隋书》的如下记载也会明了这一点。

“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关于这部武帝自夸的《通史》，《梁书·武帝纪下》（卷三）记述：“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也明确记载：“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讫梁”，其实正如《梁书·吴均传》（卷四十九）所述，吴均等人是实际的撰者。

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

又，《梁书·简文帝纪》（卷四）记述：

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如《南史·陆罩传》（卷四十八）所记述，《法宝连璧》的实际撰录者是萧子显以下三十人^③。

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连璧》。罩与群贤，并抄掇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邵之皇览焉。

此事在湘东王萧绎的《梁简文帝法宝连璧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中也有清楚的记述^④，是实际情况。

如《南史·许懋传》（卷六十）记载：“皇太子（后指简文帝）召与诸儒录《长春义记》，《长春义记》一百卷同样也是以许懋为首的诸儒撰录的，简文帝并未从事实际的编辑。

更且，《西府新文》，在《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中记作“西府新文十一卷并录。梁，萧淑撰”，而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记述：“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是梁元帝

湘东王当时撰的。这大概因为颜子推是同时代人，为顺应当时的风潮而把下令编辑的湘东王记作撰者。

只要看一看元帝萧绎自著的《金楼子·著书篇》（卷五），就会明确，在《梁书》和《隋书》这两部史书所记载的撰著中混杂着种种形态的撰著。现以《梁书》（卷五，元帝纪）和《隋书·经籍志》记述的元帝撰著为中心，将《金楼子·著书篇》与之对应的记述制表明示。（见书末附表1）。此表说明，《梁书》和《隋书》记作元帝的撰著大体有如下五种类型。

- （1）金楼（元帝号）自撰
- （2）金楼撰
- （3）金楼付某撰
- （4）金楼自为序，付某撰
- （5）金楼为序

特别是既然有明记“自撰”的，则单记作“撰”的大概是“自撰”以外的撰著，可能是由他人协助的撰著。如果“撰”是这种意义的话，则（3）、（4）、（5）的撰著当然是金楼完全没有实际参加的撰著。既然金楼曾经参与了实际撰著，那也应该像“长卅苑记一秩三卷。金楼与刘子亨等撰”（同前，著书篇）那样记上“金楼、与某撰”。

总之，史书记载的“撰”确实具有种种含义。因此，尽管史书记作“某撰”，哪怕是帝、太子、王，也显然未必是某人的自撰（也包括实际上由他人协助撰的）。

从以上问题看来，《文选》的实质性撰者是昭明太子的所谓“可靠”根据不存在了，以“他的持论”，说明《文选》的论著也失去了立论的“可靠”根据。然而，仅仅以上述事例还不能成为《文选》的实质性撰者不是昭明太子的“可靠”根据。因此，如果以明昭太子的文学观对照《文选》撰录的作品，从中发现许多矛盾点和存在着引起与“他的持论”不一致的问题，并且能证明已经